

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

导言

俞国林

1930年冬，蒋梦麟（孟邻）任北大校长。郑天挺（毅生）随之回北大，任校长室秘书。1933年12月，郑天挺任北大秘书长。时文学院院长胡适（适之）、法学院院长周炳琳（枚荪）、理学院院长刘树杞（楚青）、课业长樊际昌（遂羽）。

1937年七七事变，平津陷落。11月7日，郑天挺抛家别子，与罗常培（莘田）、庸庸（庸中）、魏建功、陈雪屏等离开北平，赴长沙临时大学。1938年3月，临时大学西迁昆明，名西南联合大学，由北大蒋梦麟、清华梅贻琦（月涵）、南开张伯苓三校长任常委，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。下设文学院、理学院、工学院、法商学院、师范学院外，另有教务处、训导处、总务处、工程处（后撤销）。

自长沙迁昆明，北大成立驻滇办事处，由郑天挺负责。又由于文学院暂设蒙自，联大派南开杨石先、清华王明之、北大郑天挺负责前往筹办，而郑天挺任总干事。郑天挺1938年1月24日日记：“此次南来，决意读书，以事务相强，殊非所望。”然而就是筹办蒙自事务，郑天挺为租借房屋、建筑校舍、教职员与学生之伙食以及学校保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干练，为人称道。

1939年年底，时任总务长为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沈履（蕪斋），因接受四川大学教务长之聘，将辞职。12月9日日记：“遇沈蕪斋，蕪斋应四川大学教务长之聘，请辞联大总务长，谓继任之选无逾于余，力辞之。蕪斋去，再向孟邻师陈其不可。呜呼！吾日夜继晷，读犹不足，安有闲暇事此哉？”但是此后，校内多有传言郑天挺任总务长之呼声。1940年1月8日，汤用彤（锡予）劝之勿就，理由是“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，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，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。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，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，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”，郑天挺以为“此语确有远见”。

不意次日，联大召开第一三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，出席者：蒋梦麟、梅贻琦、沈履、查良钊（勉仲）、吴有训（正之）、王明之、杨振声（今甫）、黄钰生（子坚）、陈序经、施嘉炀、冯友兰（芝生）、樊际昌。其“决议事项”第七条曰：“本大学总务长沈履先生因四川大学程校

郑天挺（1899—1981），原名大立，又名庆牲，报考北京大学时改名天挺，字毅生，晚号及时学人，福建长乐人，生于北京，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。1917年，入北京大学国学门，1924年起任教于北大。1933年至1950年，任北大秘书长，期间又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、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、北大史学系主任。在北大几次重要关头，如“七七事变”后的南迁、战后的复员、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郑天挺先生为人处世，谨言慎行，奉公执法，待人接物，虚怀若谷，凡有益于校务、有益于学生者，皆尽力而为，从不推诿。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，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北大学子的名义赠给他“北大舵手”的锦旗。1952年，奉调南开大学，此后主持南开历史系近三十年。

西南联大《除夕副刊》曾描述郑天挺为：“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，一身兼三职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。虽然忙碌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。”郑天挺行政事务缠身，加之一生慎重为文，留下的著述不多，但每出手都是精品。傅斯年称郑天挺“不为文则已，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”。

由郑天挺子女授权、中华书局整理校订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将于近日出版。日记自1938年1月1日起，至1946年7月14日讫，仅少数缺失，所记巨细靡遗，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、近代学术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。《文汇报》选摘部分内容，分别以“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”、“蒋梦麟辞北大校长”为题，并附导言。

长坚邀前往襄助校务来函，请准辞去本兼各职。沈先生在本大学劳苦功高，此次挽留无术，应准其离校，作为请假。”第八条曰：“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。”

之后数日，郑天挺为辞退事，多方联络，及至1月15日，郑天挺与梅贻琦一函，谓“余之不就并未谦让，亦非规避，尤非鸣高”，同时将总务长聘书璧还。

16日，联大召开第一三三次常务委员会，其“决议事项”第五条曰：“郑天挺先生函请收回总务长成命，应由本会同人一致前往敦劝，务请郑先生勿再推辞，即日就职，共荷艰巨。”是日晚间，梅贻琦专门写信一封给郑天挺，信曰：“毅生吾兄：……联大总务长非兄莫属。昨日一函，想已送达，万祈勿更推却。昨与石先约于明日十时到校，由弟陪至教处，与诸同人会晤。足下如亦能于明日上午来校，则同人之振奋更当何如！拜恳拜恳。顺颂晚安！弟贻琦，十六晚。”且杨振声告之，谓常委会诸人“定明日下午四时来寓敦劝”云。

17日上午，郑天挺先行入校，拟先与梅贻琦商量，可惜梅贻琦未来，“晤光旦，请其转达余下午来晤，不烦枉驾之意”。下午两点，郑天挺又入校，以为潘光旦已经转述给诸人矣，不意等到五点后，查良钊、沈履才找到郑天挺，并谓诸人都在他的住处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等到郑天挺晚饭后回到住处，发现有黄钰生、查良钊、杨振声、施嘉炀、冯友兰所留一信，有“斯人不出，如苍生何”之句。

18日，北大同事傅斯年、杨振声、汤用彤、罗常培、陈雪屏、吴大猷、江泽涵、饶毓泰（树人）等皆以私人情谊，劝郑天挺以不就为宜。但到20日，傅斯年、杨振声以三校合作为由，又劝之出任，盖“恐余若不就总务长伤及清华、

北大两校情感”。21日，周炳琳、查良钊、杨振声又劝之就任总务长，“以免引起校际间之磨擦，影响合作局面”，周炳琳还说，“止好牺牲个人，维持合作”。

其时正好是春节期间，诸人皆有时间探讨。而梅贻琦屡屡向蒋梦麟催促郑天挺任职，在为维持三校合作之局面，蒋梦麟也只好允之。2月9日，蒋梦麟命郑天挺“任至本年夏，以免发生误会”，郑天挺“当时心虽不愿，但师命又不便违”，“为免除校中纠纷、两校误会，不能不作一牺牲”。是晚，郑天挺与汤用彤聊天，汤用彤建议曰：“就职之先应先定政策，或全不管，或则雷厉风行，万不可依违两可。”及至2月24日，郑天挺与梅贻琦商定“后日就职”。就职后即面临买米、发薪诸杂事，但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。

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记载：“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，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‘故人’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，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、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辞，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、做人、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佩服。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，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

郑天挺1942年9月30日日记：“六时至文化巷开会，正之语众，谓自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长莫不为众矢之的，正之言联大独为例外，以余以德称也。余逊愧不敢当。余待罪此职忽将三年，幸赖全校之优容，得免陨越，乌足以言以德胜哉！”

任继愈《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》：“总务工作十分繁杂、琐碎，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，三校联合，人员的成分也很

复杂，郑先生处之以镇定、公平，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。1945年，郑先生奉派先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。他临行前，委托我和韩裕文两人清理他房间的书籍、绘画、文件，该留的留下，该销毁的销毁。我们两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，清理他八年来的函件、文件时，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：为学校延揽人才，给同事平息争端，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。……郑天挺先生善于处理纠纷，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、不扩散，使它消弭于无形。”

（作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）
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选摘

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

与锡予谈。近日校中仍欲以余继任总务长，余虽示辞意，其事未止，且未经提出会议发表，余亦不能固辞。今日锡予以余之态度相询，具告之。锡予徐曰：“吾亦不以就斯职为然。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，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，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。且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，若怨归北大而誉归他人，将来学校地位不堪设想矣。”此语确有远见，佩服之至。此老，余向钦其德其学，今日始识其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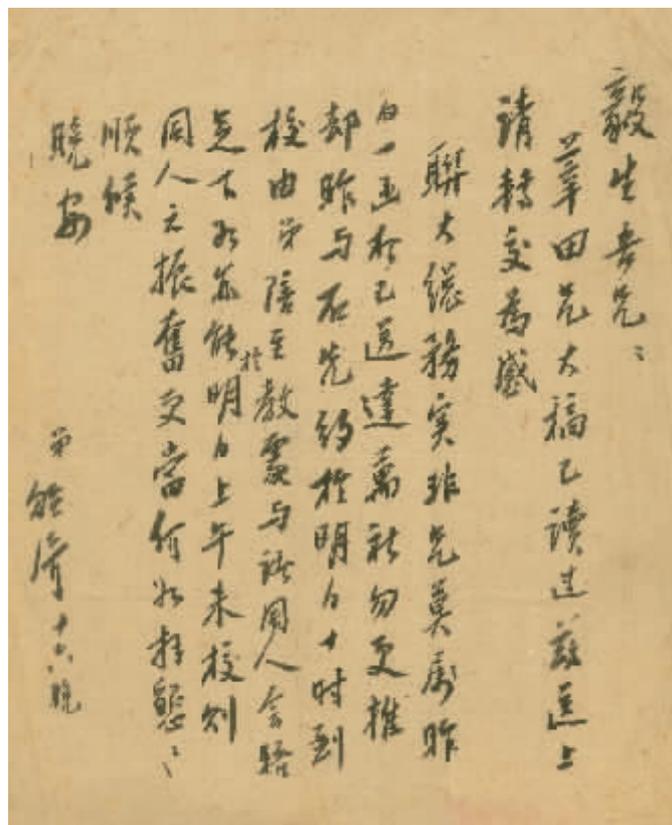
一月九日

今日校中总务处同人三十余为沈蕪斋饯行，邀余作陪。余以不愿继任，辞谢未往。三时再至校，以闻今日开常务委员会，将以余继总务长事提出会议也。作一函致主席梅月涵，请勿以余提出。大意谓闻沈总务长辞职，荐余自代，余绝不就。先以函稿陈孟邻师，然后投之。

一月十日

晓宇来书劝余就总务长，并谓郑华焯愿助余管事务，意甚可感。然余之不就之故不在此也。莘田谓余曰：“君欲为事

（下转3版）➔



西南联大“没有名义的常务校长”梅贻琦深盼郑天挺继任此职，1940年1月16日来函称：“联大总务实非兄莫属。”